

王铭铭 主编

中国人类学评论

Chinese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ume 10

第10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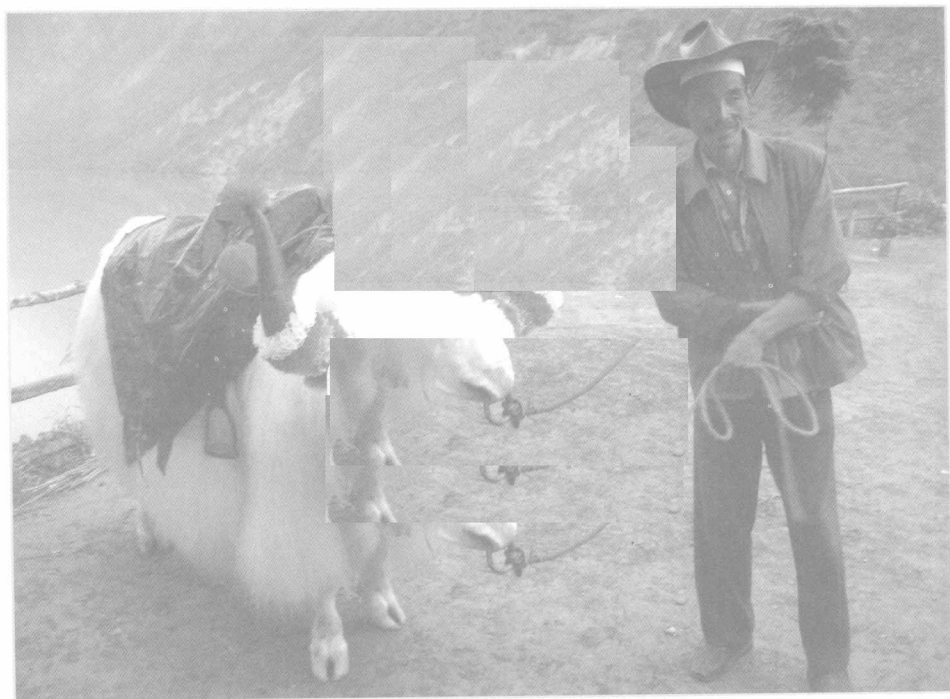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王铭铭 主编

中国人类学评论

Chinese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ume 10

第 10 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类学评论. 第 10 辑/王铭铭主编.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9. 6

ISBN 978-7-5062-9552-9

I. 中... II. 王... III. 人类学—文集 IV. Q9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8918 号

中国人类学评论(第 10 辑)

主 编: 王铭铭

策划编辑: 吴兴元

责任编辑: 马春华 黄燕华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010-6401-3086)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页 3

字 数: 300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 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读者咨询: onebook@263.net

营销咨询: 133-6657-3072 010-8161-6534

编辑咨询: 133-6631-2326

ISBN 978-7-5062-9552-9/Z · 260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学术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 戎(北京大学)
王东杰(四川大学)
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
王铭铭(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邓正来(复旦大学)
叶舒宪(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永华(厦门大学)
刘铁梁(北京师范大学)
朱苏力(北京大学)
朱晓阳(北京大学)
齐 琨(中国艺术研究院)
张江华(上海大学)
张跃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杨圣敏(中央民族大学)
杨正文(西南民族大学)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
汪 晖(清华大学)
周大鸣(中山大学)
和少英(云南民族大学)

范 可(南京大学)
胡鸿保(中国人民大学)
赵丙祥(中国政法大学)
赵汀阳(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旭东(中国农业大学)
唐晓峰(北京大学)
徐新建(四川大学)
翁乃群(中国社会科学院)
郭于华(清华大学)
梁永佳(中国政法大学)
渠敬东(中国社会科学院)
萧 梅(上海音乐学院)
黄 平(中国社会科学院)
黄剑波(首都师范大学)
彭兆荣(厦门大学)
蓝达居(厦门大学)
潘 蛟(中央民族大学)
潘守永(中央民族大学)

本辑主编助理

郑少雄 何贝莉 李金花

民族、国家与文明:重读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论著

按语	1
天下果已转变为世界?——读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郑少雄... 3
民族与国家——从吴文藻的早期论述出发	王铭铭...16
文化、夷夏之辨与史学的道统——读柳诒徵《中国文化史》 ..	张亚辉...40
从“夷夏东西说”看民族研究的文明与关系理论	何贝莉...62
读王桐龄《中国民族史》	马 戎...81
历史地看民族,民族地看历史——读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	汤 芸...102
交往的历史、“文化”和“民族—国家” ——以马长寿 20 世纪 30~40 年代的研究为例	伍婷婷...116
李济与 20 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中的“文明观”与“历史感”	张 原...131

跨学科讲坛——少数民族哲学—宇宙观研究及其人类学意义

理解少数民族哲学—宇宙观研究:开场白	王铭铭...149
少数民族哲学对人类学的意义	伍雄武...153
从东巴经来看少数民族的宇宙观	李国文...167
妈妈给的石头:对于“藏彝走廊”小族群“什巴—觉”崇拜的观察与思考	李星星...184
旧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及其德古	马尔子...199

追 忆

Anthropological and Other “Ancestors”: Notes on Setting up a Visual Archive	Alan MacFarlane...220
--	-----------------------

会议纪要

“区域、民族与中国历史的叙述”学术研讨会简报

..... 王杨伍...227

文化人类学席明纳

- “藏彝走廊”与民族 李星星...230
从《神圣的存在》看伊利亚德的宗教学思想 张亚辉...232
来自海的故事——中国海上丝绸之路 王连茂...234
委内瑞拉与尼泊尔旅行随谈 汪 晖...236
马背上的法庭 朱苏力...237

圆桌会议

上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大音讲堂”圆桌会议(节选)

..... 曹本冶等...239

述 评

- 宗教学与仪式研究 黎志添...250
那一片乡土——评张佩国的地权研究 马丹丹...259

书 评

- 《伏羲考》..... 闻一多著 兰善兴评...269
《美术、神话与祭祀》 张光直著 韩 晓评...273
《楚辞的文化破译》..... 萧 兵著 王 倩评...277
《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 臧克和著 祖晓伟评...281
《诗经的文化阐释》..... 叶舒宪著 林科吉评...286

稿 约

民族、国家与文明：重读 20 世纪前期的中国论著

[按语]

为了避开表达为众多其他概念(如社会体、政治体、经济体)的“民族体”观念,富有启发性的西方人类学家,若不是走 20 世纪前期“部落民族志”的路子,就是走此后出现的超社会“世界体系”的路子。而介于二者之间,尚有一条“文明体”研究的路子。这条路子,在 20 世纪初略带进化论色彩的社会理论叙述中,曾闪过,然因各种以国族为单位的观念,渐渐随着“20 世纪的战国时代”(费孝通语)之展开,而被浓雾所掩盖。在“远东”,兴许因“思想落后”,同一时期,学人们为了展开现代性论述,不得已回归于一个“古式文明体”的历史中,在那里,为强国与文化的复兴,而重归于多民族的文明体的过去。矛盾是有的,但这些矛盾,在一些具有高度学术自主性的前辈那里,演变为带有“中国式的社会理论”色彩的论点,这些论点,综合了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关系考虑,为我们重新思考“20 世纪的战国时代”对于 21 世纪思想依旧存在的影响提供了线索。

收录于此处的文章,除了我和马戎教授的两篇旧作之外,其余都是一年来在我的“逼迫”之下人类学专业的几位青年写的述评之作,它们可谓是一个互动密集的学术工作坊的成果。书目是我定的,其大体所关涉的,是现代学术入华之后,中国学者对于民族、国家、文明等方面的论述。这些旧作,现在读起来,仍旧充满新意,其在贯通中西方面达到的水平,实为今日中国社会科学界尚难以企及的。

工作坊讨论的范围,还涉及民国学者的民族志、礼仪人类学等领域的叙述,此处,只选编了一组关于“民族、国家与文明”这一主题的文章,而将另外一些文章留待日后处理。

关于“民族、国家与文明”这一主题,我已在“中国——民族体还是文明体?”一文(刊于《文化纵横》2008 年 12 期)中加以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除了在工作坊内部讨论过之外,所收录于此的文章,也曾于 2008 年 6~7 月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

馆、北京大学蒙养山人类学学社协办的“东南与西南”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过，后又于 2008 年 10 月提交本中心与海外中国学界几位同人合作主办的“20 世纪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第二次工作会议（作为其分会）讨论。在会议前后，作者们经常相互讨论切磋。工作坊的协同组织人赵丙祥、梁永佳、张亚辉等人，给予了他们的同仁诸多修订意见，特别是张亚辉博士，在私下和会议场合，都给作者们提出了十分珍贵的批评。另外，本辑个别文章，曾在渠敬东教授组织的读书会上讨论过，得到他的可贵评论，在此向他表达谢意。

我期待这批作品的发表，有助于我们免除某些观念形态的制约，在中国近代学术史的历史基础上，重新思考民族问题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人类学的民族研究摆脱一些表面新鲜的概念给我们带来的认识障碍。

王铭铭

2009 年 1 月 5 日

天下果已转变为世界？ ——读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

郑少雄

对于“民族”一词在中文里的最初使用，已经有多人做出专门考证^①，但是，不管在考证之前、还是考证之后，人们仍然经常认为梁启超是中国在现代意义上使用民族概念的第一人。^② 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作为晚清民国时期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对于现代民族、民族史、民族主义的论述，即使不是开历史先河，至少也产生了他人难以比拟的影响。有论者认为，梁启超提出其民族之说后，中国民族与民族史研究，几乎不可能不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③

最近，有学者根据对梁启超部分言论的分析指出，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在从天下缩变为国家的同时，实际上更经历着一次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这个世界——实际上仅为欧美国家——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已成“耳目之知”，并且彻底外在于中国。康有为解释的“公羊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以及“太平世”——已经从历时性的过程转化为共时性的世界现象。不幸的是，中国已退为“夷狄”，欧美则进为“诸夏”。当时的中国急于重新融入世界，因此，就必须鼎革国故，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实际上意味着，此时的国家建设设想，基本上都建立在近代西方的“民族国家”学理基础之上，中国思想史由此开启了一个新时代。^④

梁启超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为“观察”）、“附：《史记·匈奴列传》戎狄名义考”（以下简称“附录一”）以及“附：春秋夷蛮戎狄表”

① 黄兴涛：“‘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168～170页；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60～69页，等等。

② 安静波：“论梁启超的民族观”，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281～295页；李喜所：“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2期，139～143页。

③ 安静波：“再论梁启超的民族观”，载《学术交流》，1999年第6期，127～133页。

④ 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191～204页。

(以下简称“附录二”)^①,便可放在这一大背景下进行思考:“观察”于1905年3月、4月连载在“新民丛报”的第65、66号上^②,距“庚子之变”已经5年过去了。而梁启超自己的经历,在最近的两年间也有重大变化:其一,1903年元月至10月,他应美洲保皇党之邀,游历新大陆,回日本后“言论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至是完全放弃,这是先生政治思想的一大转变,以后几年内的言论和主张,完全站在这个基础上立论”。^③其二,同年底,即撰写《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有论者认为,伯伦知理的“国家有机体”学说对梁启超的影响极其深刻,直至辛亥革命之时,梁氏犹持此说。^④张灏则认为,梁在美洲归来之后,就热情拥抱德国国家主义政治理论,其所关心的是更为广泛的“国家理性”问题,也就是政府确保国家生存和安全的理性行为。^⑤其三,1904年,日俄战争俄国失败,旋即俄国开始立宪;同年8月,“英藏新约成,举国痛愤,争之无效,先生撰《英国之西藏》和《哀西藏》两文”。^⑥凡此种种,对梁启超撰“观察”一文应该都产生了可以预料的影响。当然,要了解梁氏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民族思想,还是应该回到对他的文本的详细解读。

晏省界之争,唤起民族共同情感,以应列强

梁启超写作“观察”的目的,直接起因于当时的形势,“世界眈眈六七强,方俎置我中国汲汲谋割食日不给,而我于其间乃有所谓省界问题者,日益滋蔓。人人非之,人人蹈之,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⑦也就是说,当列强环伺之时,国内却自治思潮正急,尤其是,“1903年前后,旅日留学生中间的‘省界’之分已经成为观念上的一大‘梗蒂’,便召来种种之批评。省界胎于庚辛之间,广人‘新广东’出世,省界问题如花初萌,于时各省同乡恳亲会,先后成立,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

① 《饮冰室文集点校》里的“观察”一文仅收“附录一”,但在“梁启超全集”里,“附录一”、“附录二”和“观察”都放在一起发表。鉴于“附录二”开头的作者按语里,梁表示“附录一”、“附录二”是“同时作,皆旧著《国史稿》之一部分”,因此我认为把两个附录都作为“观察”的一部分来理解是较为合理完整的。

② 据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吴松等点校,1690页,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在許多地方被误为1906年发表。

③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3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④ 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234~268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⑤ 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175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⑥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348页。

⑦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1678页。

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①对于其时已经完全服膺伯伦知理国家主义学说的梁启超而言，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迫切问题。如何消除国内省界自立意识、而使中华民族产生一体之观念呢？梁启超的做法是“有事于国史，泛滥群籍”，寻找历史上中华民族融合的史实和依据。虽然，他说“其将唤起我民族共同之情感，抑将益增长我民族畛域之感情，非所敢言也”^②，但对照上述的列强环伺说，他希望凭借这篇文章唤起民族共同情感的态度，当无疑义。

关于汉族里的“炎黄遗胄”是否“中国原始之住民，抑由他方移植而来”，梁氏说“吾则颇祖西来之说”。既然花这么大力气考据历史，也深知“炎黄一派”的起源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梁氏为何漫不经心的即以“西来说”“为假定前提，本论考证，不复及此”呢？让我们回到“西来说”的源头观察。“清末，对于中国人种和文明源自何方的问题，西方、日本学者作了种种考释，提出种种说法。最能博得中国知识界赞赏和信从，并令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知名学者与思想家推崇的，是帕米尔—昆仑山和巴比伦两种西来说。”^③梁启超遵从前说，他在 1901 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中，认为“黄帝起自昆仑之墟，即自帕米尔高原东行而入于中国，栖于黄河沿岸，次第蕃殖于四方”。^④一般认为，刘师培、章太炎等人服膺西来说，是为了证明汉人优于满人，以达到“排满兴汉”的目的；^⑤而梁氏至少在 1903 年已经阐述了“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⑥的观点，那么梁启超接受西来说，我认为应当和对外族、也就是世界列强竞争联系起来，才能获得理解。梁启超的朋友、同为温和派的蒋智由曾写道：

夫以青史轰名之摩西，世咸啧啧，称其率以色列族，出埃及而建犹太之国，为不可及之事。然其徘徊四十年，卒不越红海之滨。即近日欧洲诸国，殖民全球，然亦因蒸气船之发明，与恃其器物之利用，而人类始得增一层之能力。孰若我种人，于上古四千年前，世界草昧，舟车未兴，而超越千万里高山崱嵫沙漠出没之长道，以开东方一大国。是则我祖宗志气之伟大、性质之勇敢为何如？而其事业之雄奇，又直为他人种之所无，足以鼓舞我后人之气

① 转引自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 年第 2 期，66 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1678 页。

③ 李帆：“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66 页。

④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1623 页。

⑤ 李帆：“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68～70 页。

⑥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454 页。

概者，抑又何如也？^①

由此可见，对梁氏而言，接受黄帝率部西来之说，除了证明中华和泰西同种外，还可看出中华族在上古时代创立的功绩远在西人之上。那么，今天的中国人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和自信来与西人“竞争交涉”而进于“发达进化”了。

除了上述的“西来说”以外，梁启超还对另一个前提——“主权上主族客族之嬗代”——不予置论，而其理由则是，这个研究“属于学术范围，不属于政论范围”。这里“主族客族”所关涉的，实际上就是历史上蒙古、满族“客族”入主中华帝国的合法性问题。作为政论，前面提过，梁自美洲归来后已经彻底放弃“排满”言论。而且，为了证明满族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他曾不遗余力证明满族在明朝年间即曾接受过中央的羁縻，“其酋长时受策命”，所以满族之统治中原，只是和历代“改朝易姓”无甚区别的一件事，而非革命党人所说的“汉人亡国”。^②下文将会提到，梁氏认为满族今已完全同化于汉人，那么，其性质和历史上蛮夷之同化于华夏又何异哉？不过时代先后而已。

中华民族(汉族)自多元而渐归于一体

梁氏讨论汉民族历史，是先从发问开始的：

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自初本为一民族乎，抑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一问题。若果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则其单位之分子，今尚有遗迹可考见乎，其最重要之族为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二问题。中华民族混成之后，尚有他族加入，为第二次，乃至第三、四次之混合否乎，若有之，则最重要者何族，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三问题。民族混合，必由迁徙交通，中国若是初有少数民族，则其迁徙交通之道，有可考见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四问题。迁徙交通之外，更有他力以助长其混合者否乎，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五问题。迁徙之迹，限于域内乎，抑及于域外乎，若及于域外，其所及者何地，其结果之影响若何，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六问题。此问题即“中国以外更有中华民族所立国与否”之问题也。中华民族，号称同化力最大，顾何以外来之族多同化于我，而我各省各府各州县，反不能为完全之自

^① 转引自杨思信：《拉克伯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反响》，载《中华文化论坛》，2003年第2期，143页。

^② 参见王春霞：《“排满”与民族主义》，18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力同化，此吾所欲研究之第七问题。自今以往，我族更无求以进于完全同化乎，抑犹有之乎，若有之，其道何由，此吾所欲研究之第八问题。^①

通观全文，梁氏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有的做了充分的解答，有的则存而不论。为理解的方便计，上述问题可以合并为下述几者来讨论：

首先，自先秦起迄于今，以华夏为中心，融中国本部诸多民族（“蛮夷”），经无数混合乃成汉族。

梁氏首先推断的是，汉族系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其证据便是语言。德国人种学家曾谓“血浓于水，语浓于血”，其意就是同源固然重要，但是语言的统一对于民族形成犹为关键。梁氏认为，汉族内部的情况恰恰完全相反，“环观全球万国，以同一民族，而其言语庞杂沟绝不能相通，则未有中国人若者也……不惟省与省为然耳，一省中一府中乃至一州县中，出闾阎而若异域者，比比然也”。^②那么，汉族还称得上是一个民族吗？如果是，其原理何在呢？梁启超认为，中国各地方言固然彼此相异，在春秋（《礼记》）、战国（《孟子》）、秦一统（《说文》所载为例）、汉代（扬雄《方言》所记）尤甚，但是必须注意到“李斯以秦语齐一国文”之后，“可见文系能改变语系，使其语尾变化渐渐渐灭矣”，也就是说，文字统一，使语言的多样性渐趋减弱。今天可见的例子就是，满人“无文字，及其既入中原，则用中国文字，久之遂不得不弃其语系以从我文系。故至今满人中，其能操满语者，已十不得一，其语系之灭绝，可立而待也”。历史上“其他诸民族语系之灭绝”，也是同样的道理，只是距今遥远，今人未能觉察而已。这里暗含的意思就是，虽然今天方言繁多，未来则必将渐渐归于一致，所谓“此种文字之吞灭语言，其力之伟大可想矣”。通过这样的论证，梁氏“悍然下一断案曰：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③

那么，汉族是由哪些民族融合而成的呢？必须注意的是，梁氏认为，今日混成中华民族者，除了华夏一支以外，不管出自《王制》所列蛮、夷、戎、狄四裔，抑或《说文》所列蛮、闽、狄、貉、羌、戎、蜒等，也“总不出今之本部十八省以外”。梁“凭古籍，搜遗迹，举其大者”，认为“先秦以前，分宅中国本部诸族，除炎黄一派之华族以外，凡得八族”，那就是苗族、蜀族、巴氏族、徐淮族、吴越族、闽族、百越族、百濮族，正是这八族的全部或一部分融于华夏人而形成今天的汉族。梁启超在此后的进一步研究中，对这个分类有较大的修改^④，史实史迹或有出入，但是其原理则是前后一致的。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1678～1679页。

② 同上，1679页。

③ 同上，1680页。

④ 同上，第五集，3216页。

各族同化于华夏中原的时间各不相同:蜀族,“历两汉三国,同化殆尽”;巴氏族,“至西魏后周……其族遂衰”;徐淮族,“至秦一天下,东夷乃渐同化矣”;闽族,“汉武帝平闽越……此族受创夷,盖特甚焉”;吴越族的同化时间,梁氏未置论。但上述诸族,“率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无复有异点痕迹之可寻”。苗、濮退至西南一隅,两者同化程度甚低,且百濮“至今犹悍然为梗于一方”;百粤则“其留纯粹之血统以供我辈学术上研究之资料者,惟此而已”,可以猜测,梁氏认为,中华民族进一步融合居于本部的各异族,须“俟诸异日”,但必然可以实现。

其次,中华民族混合的动力问题。

梁氏认为,民族混合的动力,“必由迁徙交通”,那么,迁徙交通的过程和历史痕迹,该向哪里去寻找呢?让我们以苗族为例说明。苗族和华夏的交涉最早,“自黄帝迄舜禹,为剧烈之竞争,尽人知之”,他们最初的根据地,“《左传》指定位置曰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南、湖北、江西部分地区;最盛之时,“涉江逾河,伐我炎黄”,“黄帝起而攘之”,到舜征苗的时候,已经到了湘桂之交;汉光武建武中,其“窟穴已移于洞庭以西”;隋唐间,在今湖南辰州永顺;宋元明清,又逐渐向西退避。总而言之,梁氏认为,“此族千年来退避的迁徙,其迹最历历分明,由江北而江南,由湖东而湖西,卒溯沅江以达其上游苦瘠之地,辗转委靡以极于今日也”。苗族的迁徙交通,看似在逐步远离中原,与中华族的混合全然无涉,何故?在此后的另一篇文章里,梁修正了这个看法,指出苗族虽然越退越远,但在西南边陲最终还是部分融入了汉族,虽然已经甚为晚近了。^①

另一个混合的动力我认为来自文字统一和文明扩张,梁氏虽未明说,但言语间多有暗示。他认为,中国境内的民族能自创文字者甚少,所以,一旦接受汉族文字后,他们的语言就会渐渐趋于没落,直至消亡。

最后,梁启超对汉族内部诸族地位的看法。尽管梁氏把“炎黄遗胄”称为“我中国主族”,把对异族的融合称为“同化”,认为华夏文明应当高于诸异族,但是,对民族间关系还是尝试以平等待之的。比如,他认为《说文》所训释“蛮”、“闽”、“狄”、“貉”等字,都是“出于自尊卑人之习,不可据”;又如,他提出,“前所论列八族,皆组成中国民族之最重要分子也”,可见他一视同仁的态度;再如,他说“其族(指八族)当邃古之初,或本为土著,或自他地迁徙而来,今不可考”,也可以看出,他认为诸族或许像华夏一样,自西方而来,也未可知。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五集,3219~3220页。

今天的异族，明日的大中华？

梁氏此文的标题是“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这里的“中国民族”应该理解为“中华民族”，也就是汉族。在梁启超的心目中，所谓“中国”、“中华国”的范围包括了清朝廷统治力量所及的地区当无疑议，那么这个“中国”、“中华国”当然也就包括了满汉蒙回藏苗诸族在内，既是如此，为何梁启超要放弃现成的汉族名称不用，而一再使用“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来指代汉族呢？而且，梁启超只论及汉族，而彻底忽略了满汉蒙回藏苗诸族，可能会导致我们认为，毕竟他曾与孙中山等人合流，倾向激进的“革命排满”，所以他心目中的民族主义是建一个唯有汉族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实际上，梁氏的矛盾不难理解，因为“若其近古以后，灼然见为外族，其大部分今犹为异种”，也就是文化上与汉族截然不同的其他人群，主要是蒙回藏诸族。这些“异种”，与中华民族的关系该如何处理，确实是一个值得深虑的问题。“附录一”与“观察”本各自为篇，梁先生称“数月前旧作一篇，言古代诸族之关系者，今录以供参考”，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梁先生思考、探究异族源流、交涉问题，尚在汉族之先；第二，将之作为“观察”的附录一起发表，至少说明梁先生希望把我族(中华民族)、异族的关系放在一起思考。从下文可知，《史记》里被误为“匈奴”组成部分的戎狄，实际上已经包括了今天满蒙藏诸族的祖先了。

梁氏认为，国史里所记，“外族统曰蛮夷戎狄，其事迹互相出入”不可辨，“凡治斯学者所同以为病也”，所以他的愿望是“先研究春秋以前错居大河南北诸族，以《史记·匈奴列传》为主，别其部居，析其谬误”，主要问题有三：

1. 文中所谓戎、所谓狄、所谓胡，为别名耶？为通名耶？
2. 若为通名，则诸戎诸狄诸胡，悉为同种耶？抑其间各有别种耶？
3. 若各有别种，则何者与匈奴为同种？何者与匈奴为别种？^①

蒋智由根据《礼记·王制》、《春秋》、《左传》及《山海经·穆天子传》诸书，认为戎狄是通名而已，不可据以分人种界限，梁氏采纳他的说法，这就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梁启超自己“据群籍以比推之”，认为《史记》所载的戎狄，实际上应该是三族，这就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三族是：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1686 页。

1. 根据今山西陕西而侵入杂居于内地者。
2. 根据今甘肃而侵入杂居于内地者。
3. 根据今辽东而侵入内地但未杂居者。^①

据山西陕西者,自黄帝起就与华夏征战,至秦汉时华夏一统,他们也成就了匈奴的统一,于是“南北两帝国对峙,致成汉代之剧争”;据甘肃者,此族与“匈奴之族,其起源截然不同甚明”,本“三苗之裔,其后衍为羌族者”;据辽东者,“即后世契丹金源满洲之族”,在春秋时即猖獗于东北;在秦汉时,与匈奴为敌;汉后数千年,与匈奴皆不能同化。所以梁氏认为其和匈奴也当为异族。这样就回答了第三个问题。

总结来说,“根据今山西陕西而侵入杂居于内地者”形成匈奴,也是后世蒙古一部的祖先;“根据今甘肃而侵入杂居于内地者”形成羌族,即后世藏、羌族的祖先;“根据今辽东而侵入内地但未杂居者”形成通古斯族,即后世满族的祖先。通过这些考证,梁启超基本上找到了今天汉族以外诸族的历史源流,及其和华夏族甚为久远的历史互动。

“观察”所谈的,主要是“蛮夷”;“附录一”所涉及的,则是戎狄。但不管是“观察”还是“附录一”,时间都长及整个先秦以前。在“附录二”里,则仅就春秋一代而言,而且蛮夷戎狄被放在一起加以考虑。梁启超通过列表,清晰地勾勒出华夏与四裔交涉往返(主要表现为战争和征服)的过程。在这个表里,构成清帝国版图下所有民族的祖先都得到了反映,而且各族与华夏的关系都是如此的纷繁复杂。

从天下到世界:国家主义和竞争进化

到其1902年写“新民说”、“新史学”等文时,梁启超已经被认为彻底放弃“公羊三世说”,转而认同民族国家思想,成为一个成熟的民族主义者了。^②更重要的是,梁启超提出了一套新的世界秩序观,为国人接受政治现实增添合理性:那就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黑色、红色、棕色、黄色和白色人种之间的生存竞争,而且这些竞争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梁氏认为,竞争的结果是,人种分为两类:“有历史的人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1687页。

^② 张灏认为以“新民说”为标志,参见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105~108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张朋园则以“新史学”为证,并参考了萧公权的看法,认为梁启超此时已经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了,参见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20页、28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种，有非历史的人种……能自结者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①其意就是，能在竞争中自我结合成一个有力团体的，才能抵抗外种生存下去，从而成为历史的人种（民族）。这个“结”字正是理解“观察”一文的中心，它不但说明了中华民族（汉族）以华夏为核心，混合历史上诸多其他民族的过程和机制，也体现了梁启超搜寻古籍、发微探渐以证明汉族源流所依据的理论资源。

梁启超认为，“近世列强之政策，由世界主义而变为民族主义”，自从达尔文“发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理”以来，“（列强）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②因此，梁氏民族主义的产生最初主要是对外来帝国主义的一种回应，而且：

梁理解和欣赏的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不是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所称的“达尔文式的个人主义”，而是他所称的“达尔文式的集体主义”。用梁个人的术语来说，他最为关注的竞争是他所称的国际间的竞争——“外竞”，而不是指一个国家内的竞争——“内竞”。^③

固然，我们应当认识到，强调“外竞”，并非意味着必须抹杀“内竞”，恰恰相反，梁启超充分认识到，“一个团体从事外竞的能力取决于由内竞自发产生的凝聚力和实力”。^④梁氏所描绘的过程恰恰说明了这一道理：华夏和诸族融合的历史，就是一部以“征”、“战”、“伐”、“克”、“逐”、“平”为几乎全部特征的内部竞争史。要注意的是这些词并非仅指华夏对异族而言，比如苗族也可以“涉江逾河，伐我炎黄、华族之不斩如缕”。所以这种内竞是相互的。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认为“征伐愈多，则调和愈多，而一种新思想，自不得不生”。^⑤在“附录二”里，梁启超更是直抒胸臆：“外族之错处，于我民族之统一事业，最有助力焉”，就是在和蛮夷戎狄的内部竞争中，汉族才得以统一和强大。

但是，列强环伺，梁氏关心的终究是融合以应“外竞”，那么一切导致中国从内部分裂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比如“省界”问题。其历史上的教训则是，“群狄始以合而强，终以分而灭”。因此，汉族内部虽然“内竞”，但终究是融为一体的。这还不够，梁还认为：“自今以往，中国而亡则已，中国而不亡，则此后所以对于世界者，势不得不取帝国政略。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

①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1634 页。

② 同上，789 页。

③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115 页。

④ 同上。

⑤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一集，223 页。